



跟大师学国学

吕思勉 著

三国史话

中华书局



跟大师学国学

吕思勉著

三国史话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史话/吕思勉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6
(跟大师学国学)

ISBN 978-7-101-11822-3

I.三… II.吕… III.中国历史-研究-三国时代
IV.K236.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3651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三国史话 |
| 著 者 | 吕思勉 |
| 丛 书 名 | 跟大师学国学 |
| 责任编辑 | 聂丽娟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889×1194 毫米 1/32
印张 7¼ 字数 110 千字 |
| 印 数 | 1-6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11822-3 |
| 定 价 | 25.00 元 |
-

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

——“跟大师学国学”出版缘起

这是一套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。

“国学”之名，始自清末。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，号为“新学”、“西学”等，与之相对，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“旧学”、“中学”或“国学”等。

晚清民国时期，东西方文化会通碰撞，人文学术勃兴，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。他们的著述，历经岁月洗磨，至今仍熠熠生辉。我国古代经典，浩繁艰深，而这些著作无异于方便后人接近经典、了解历史与文化的一座座桥梁，其价值自不待言。

遗憾的是，出于诸种原因，这些著作，有的版本繁多，错漏杂见，有的久不再版，一书难觅。有鉴于此，我们特组织出版“跟大师学国学”书系，从中遴选出一些好读易懂、简明扼要的作品，仔细编校，统一装帧，分批推出，以飨读者。

这些作品，大多是一版再版的经典，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，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较高知名度；另有一部分，出自当日名家，影响很大，但1949年后未曾重印，借此次机会，将之重新推荐给大家。

这些作品，有的是为高中生所撰的教材，如张荫麟先生《中国史纲》；有的是为青年学生所作的讲演，如章太炎先生《国学概论》和梁启超先生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；有的是应约为青年人所写的通

俗读物，如吕思勉先生《三国史话》——都是大家名家面向年轻读者讲述，不作高头讲章，也不掺杂教条习气。这正应了曹聚仁先生记录章太炎先生所作国学讲演时所说：

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，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：第一，他运用精利的工具，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；第二，他站在前面，指引途径，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。

这也是本书系立意所在——让年轻一代享受大师们的文化成果，学习大师们的治学方法，感知大师们的智慧才情。朱自清先生说得好：“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，而在文化。……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，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，也有接触的义务。”这对当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，也许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提醒。

我们希望，这些作品能在新的时代，帮助年轻朋友熟悉经典，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9年4月

大师说史 兴味悠长

张耕华

一百多年前,梁启超为“新史学”而倡导“史学革命”,其方向之一就是变史学的“帝王之学”为“为国民写史”。所谓“为国民写史”,不仅是历史写给国民看,还是历史要为国民写。百余年来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,但就“为国民写史”而言,离“新史学”追求之目标还相差甚远。由电视台“名家讲座”而带来的“品三国”热潮,以及报上对怎样说史的讨论,都不妨看作学术界为“为国民写史”而进行的有益尝试和探索思考。近日,中华书局重印史学家吕

2 三国史话

思勉先生所写的《三国史话》，可以为学界当下的尝试和思考提供借鉴。

上世纪的三十年代，苏北游击区的江苏文化社，组织编辑部筹划出版图书刊物。已故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当时在编辑部工作，便约请自己的老师吕思勉先生来写一本历史通俗读物。吕先生想，要写历史通俗读物，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是最佳的素材；因为人们所熟知的三国的史事和人物，大都来自《三国演义》，但是《三国演义》毕竟是一部演义体的历史小说，人们从中获取的历史知识，或者用演义中的观点来评说历史人物，就会造成许多谬误；而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来讲述三国历史，既可纠正人们历史观念和知识上的谬误，也能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。

吕先生的《三国史话》，实在是他《秦汉史》的副产品，融入许多他独特的研究心得。此次出版，附录中还收录了吕先生有关三国历史的20篇札记。读者如能将这此札记与《史话》的叙述相互对照，或进而再读他的《秦汉史》，就可以体会史家“说史”与演义体的历史小说大不相同。

说史如“烹调”，评话家、文学家要刺激受众的口味，一定要多加“佐料”；史学家追求历史的“原汁原味”，不仅不能多用“调料”，还要对什么能“吃”、什么不能“吃”细加甄别。吕先生说：“解释古事，批评古人，也不是绝对不可以，不过要很谨慎，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。谨守着这个范围，我们能说的话，实在很少。然在这些少的话中，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。其意义，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，深长得多。”我以为：纠正错误的历史知识；

揭示一些为人忽视的史事真相；说点意味深长的历史意义，是这本《三国史话》的三大特色。

汉末三国这段历史，需要纠正的历史谬误甚多，第一号需要辩诬的历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。记得五六十年代，郭沫若先生曾撰文为曹操“平反”，说曹操的所作所为实在继承了黄巾起义的未竟之业，结果引起了好多批评的意见。其实，吕先生为魏武帝的辩诬比郭先生早了二十多年，且立论、视角都不相同。吕先生说：政治本不是好事情，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耍些阴谋诡计，原也是政治家不可或缺的手腕，我们正不必以此来评说他的是非功过。曹操在五十多岁时曾写过一篇类似“自述”的《己亥令》，其中说道：（有人说我要篡汉），要我放下兵权，回到武平去，却是势所不能的。一者怕离了兵权，被人谋害，要替自己的子孙打算；再者，我如其失败，国家也有危险的；所以我不能慕虚名而受实祸。从前朝廷封我三个儿子做侯，我都力辞不受，现在倒又想受了。并不是还要以此为荣，不过要自己的儿子多建立几个国家在外，为万安之计罢了。吕先生说：读曹操的《己亥令》，就知道他是一个老实人。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，说话能够坦白。历来的英雄，“遮遮掩掩，修饰得自己一无弊病的”，谁能像曹操这般老实坦白呢？而将他视为奸臣，则是受《三国演义》和说书人的影响。

其实，不光《三国演义》所叙的史事谬误甚多，就是《三国志》的记载也有错误和不实，诸如此类的辩诬、纠错、求真，在这本《三国史话》里甚多：如曹操攻陶谦是否是为父报仇？孙策渡江袭击许都的真实原因是什么？赤壁之战时孙权、周瑜、鲁肃何以决心抵抗曹

操？魏延的将略以及谋反降魏的真相？钟会是司马昭之心腹，何以有反司马昭的野心？附录中的《诸葛亮南征考》，专考《汉晋春秋》有关诸葛亮“七纵七擒”孟获的记载，作者认为：“攻心攻城，心战兵战，后世侈为美谈，其实不中情实。”“亮之素志，自在北方；其于南土，不过求其不为后患而止。……粗安粗定，自系本怀。一出未能收平，原不足为亮病，必欲崇以虚辞，转贻致讥失实矣。”

《三国演义》的叙事，凡事好像都有“定数似的”，说兵谋、论军事，也总是说得“如有神算”、“似有天助”。其实，天底下的事哪有这般简单呢？吕先生的这本《三国史话》，看似平常无奇，其背后都有他一番求索考订的功夫，尤其是要纠正一些人云亦云、似是而非的观念，揭示一些为人忽视的史事真相。如论者多说，曹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吕先生则认为主要“还是因其政治清明，善于用兵”，和挟天子以令诸侯关系甚小。书中说赤壁之战，“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，有其致败之道，然而孙、刘方面，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”。再如官渡之战，通常都说曹操是以少胜多，这自然也是事实。不过此役曹操也是孤注一掷，其兵谋也并非如《三国演义》所说的那样“成竹在胸”。建安五年四月，曹操虽击斩颜良、文丑，然并未伤及袁绍的主力。其后，两军相持四个月，袁氏充分利用持久之计，至八月才发起进攻，以至曹操军粮垂尽，兵势危急，写信给后方的荀彧，想要退兵回许昌了。幸亏荀彧力主不可退却。曹操带五千兵偷袭屯守鸟巢的淳于琼，实也是“舍死忘生，拼个孤注一掷”。至于官渡战后，形势虽变为南强北弱，但要“说曹操的兵力就可以一举而扫荡袁绍，那还是不够的”。曹操破

陶谦、吕布、袁术等，前后不过两三年；而袁曹交兵，前后共历九年，可见“袁绍确是曹操的一个劲敌”。

吕先生说史，富有大局观，而不斤斤于无关宏旨的情节渲染。书中说关羽之败虽与其“刚愎而贪攻”有关，然“通观前后”，刘备的心计太工和急于并吞刘璋不能不说是一个远因。“倘使刘备老实一些，竟替刘璋出一把力，北攻张鲁，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。张鲁既下，而马超、韩遂等还未全败，彼此联合，以扰关中，曹操倒难于对付了。刘备心计太工，不肯北攻张鲁，而要反噬刘璋，以至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和凉州的时间，而且仍给以削平张鲁的机会。后来虽因曹操方面实力亦不充足，仍能进取汉中，然本可联合凉州诸将共扰关中的，却变做独当大敌。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，而荆州丧失的祸根，就潜伏于此了。”书中说后汉的动乱，特地指出这与西凉兵的强悍和凉州一带民风好乱有关，而这“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，其中实含有很深远的民族问题、文化问题”。

我们估量一个人懂不懂历史，往往以知道、记得史事的多少为标准，这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。不过，过去的史事，总要今人细心去体会才会觉得有意义、有用处。光以记得多少来衡量，实也不能算是懂得历史。黄仁宇先生曾说：“作为人师，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，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，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，不免扪心自问：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？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？”（《中国大历史》）同样，说史者如不厌其烦地探究清圣祖是“传位十四子”还是“传位于四子”，总想借此说

明一点道理吧,否则如“昨夜邻人猫生子”一样,记述它又有何益呢?所以,通过史事来说明事理,也是吕先生说史的一个目的。

比如,西汉所设的刺史,是专门用来监督太守一级行政官的,他们官位比太守低,资格比太守浅。用小官去治大官,这且不颠倒了政治上的秩序?当时人因此而有一番“刺史该不该改州牧”的议论(改为州牧,就算是太守的上级官,可用资历较深的人去担任)。这些历史上的制度和议论,对于二千多年后的今人,有何价值和意义呢?吕先生说:西汉的刺史设置,仍有相当的价值,而当时人的议论则不足取;因为,行政与监督本为两个系统,“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,监督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。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,而且也要有相当的技术,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,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。至于监督官,则重在破除情面。要锋锐,不要稳重。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,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。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,看得世事不入眼,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。要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,可以一意孤行,不要交际多了,处处觉得为难”。以现在的事情来比喻:“学校里初毕业的人,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,宜于做监察官。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,宜于做行政官。”

又如汉代的外戚问题,吕先生也有一番论述。他说:封建宗室,后来要互相攻击,甚至对天朝造反,这是从封建时代就积累了长久的经验,所以后来就不行封建了。外戚秉政,足以贻祸,其时经验尚浅,以至于前汉为外戚所篡,后汉还是任用外戚。“一种不适宜的制度,人类是非经过长久的经验,不会觉悟的”,“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到灭亡的时节,虽有弊病,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

好,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”。读吕先生的史著史论,我们知道他特别推崇先秦至西汉的社会改革思想和议论,他认为:与其责怪身居其位之人,倒不如反省检讨社会制度之不善;不改革社会制度之不善,而专责人在恶制度下之为善,不可得矣。(吕思勉:《中国现阶段文化的特征》,原刊《中美日报》1940年4月5日)

总之,《三国史话》的写法和特色,对我们今天写历史通俗读物和普及历史知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。与七八十年前相比,当代的青年学生、职员白领的历史知识,主要是从课堂上、教材中获得的,离开学校之后,很少还会正儿八经地去阅读严肃的历史书,甚至《三国演义》也少有问津。他们所知的三国故事,往往还不是从《三国演义》那里获得的,而是来自于电视、甚至网络上的“三国”游戏,他们津津乐道的是:赵子龙的武功、诸葛亮的智商、刘备的人脉……回到上文所说:说史如“烹调”,怎么“烹调”出大众欢迎、“吃”了又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历史“菜肴”呢?这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。

目 录

大师说史 兴味悠长(张耕华)	1
楔 子	1
宦 官	5
外 戚	13
黄 巾	21
历史和文学	29
后汉的地理	33
董卓的扰乱	39
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	49
曹孟德移驾幸许都	61
袁绍和曹操的战争	67
赤壁之战的真相	77
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	87
替魏武帝辨诬	99
从曹操到司马懿	109

2 三国史话

替魏延辨诬	115
姜维和钟会	123
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	131
司马懿如何人	137
司马氏之兴亡	143
晋代豪门斗富	149
附 录	
后汉乱源与三国始末	154
袁曹成败	167
论魏武帝	172
曹嵩之死	175
诸葛亮南征考	176
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	180
奖率三军,臣职是当	184
如其不才,君可自取	185
马 钧	185
关羽欲杀曹公	186
李 邈	187
姜维不速救成都	188
孙策欲袭许	189

边章、韩遂	192
张纯之叛	193
君与王之别	194
罢 社	196
吞 泥	196
三国之校事	196
山 越	199
后 记(李永圻 张耕华)	207

楔子

斜阳古柳赵家庄，
负鼓盲翁正作场。
死后是非谁管得？
满村听说蔡中郎。

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，所说的，便是现在的说书。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，然到后来，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，加以润饰以供众览，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。平话俗称小说，亦谓之闲书。虽然是用以消闲

的,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,实在不少。

现在中国的书籍,行销最广的,是《三国演义》。据书业中人说:他的销数,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。这部书有些地方,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,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;有些地方,却全是质实的记事,简直和正书差不多。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。说得多的地方,穿插改造得多了;说得少的地方,却依然如故。

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。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。有些成绩低劣的,真“不知汉祖唐宗,是哪一朝皇帝”。然而问及三国史事,却很少荒谬绝伦的。这无疑是受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。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,然而这种知识,在社会上普遍了,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,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。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。

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,往往以知道的、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。讲历史,自然尤其是如此。但无意义的事实,知道了,记得了,有什么用处呢?尤其是观点误谬的,知道了,记得了,不徒无益,而又有害。而且平心论之,也不能算知道史事。因为历史上的事实,所传的,总不过一个外形,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,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、考证他、解释他。观点一误,就如戴黄眼镜的,看一切物皆黄,戴绿眼镜的,看一切物皆绿了。我们在社会上,遇见一个人、一件事,明明是好的,却误把恶意猜测他,就会觉得处处可疑;明明是坏的,却误当他好的,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。历史上的事情,又何尝不是如此?

从前论史的人,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。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